

从石器文化中缅印交角区古代民族 联动共生的历史进程*

李佩燊

内容提要 石器时代,中缅印交角区内就已存在古代民族^①的迁徙和流动,使区域内的石器文化呈现同质性和共享性的特征。根据石器的不同器型、纹饰和制式,可以大致推断出源于甘青地区的氏羌系民族不断南下渐次迁徙的历史过程。进入青铜时代后,源于我国长江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流域的百越系民族持续西进,与世居于中缅印交角区东南部的濮系民族及先前至此的氏羌系民族产生了充分的交流与整合,石器文化进一步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特征,生动阐释了古代民族联动共生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石器文化 中缅印交角区 古代民族 联动共生

中缅印交角区位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的交界地带,主要包括今中国云南的滇西北地区、西藏自治区的藏东南地区、缅北地区和印度东北部。把地理上相互邻近、边界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中缅印交角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主要缘于区域内以氏羌、百濮及百越等同源族群在历史上的流动和交流一直未曾断绝且持续至今。进入21世纪后,以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及J. C. 斯科特(J. C. Scott)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把这一跨越多个国家的特殊区域定义为“佐米亚”(Zomia)^②,并将其作为与其他不同类型区域的区隔,成为中缅印交角区形成的标志。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注意到自新石器时代起数量众多的古代民族便已在区域内留下了自己生活和发展的痕迹。本文定义的石器文化指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时代中缅印交角区内那些相同及相似的石器文化元素。

从当今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缅印交角区属中国、缅甸和印度三国的交界区,同时也是与三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相距较远的边缘地带,但通过众多南北向的河流和山脉的连接,使这一区域与中南半岛形成了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根的共同体。通过追寻区域内古代先民们留下的石器文化,能更加清晰地勾勒古代民族的迁徙流动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我国古代先民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是被称为“西戎”的民族集团,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化,氏羌民族从“西戎”中逐渐分化独立,并在不断南下、西进再南下的过程中将其文化因子广泛遗留在中缅印交角区内。进入青铜时代后,交角区内的共同文化因素表现得更加显著,让我们可以依稀勾画出古代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图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项目号0130060402001)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独龙江流域各民族共生关系的历史形成与当代延续研究”(项目号:YB2022068)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本文所指的古代民族主要指源于我国甘青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云南南部的以氏羌、百濮及百越为代表的古代民族群体。

②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s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pp. 647-668.

一、细石器文化——氏羌系民族南下与濮系民族相融合的见证

细石器一般用狭小叶片状的石头为原料将其装备或者镶嵌在木柄、骨头或者动物角上来制成武器或工具。体积较小的细石器反映了打制技术的复杂性,展示了人类社会由狩猎采集经济进入畜牧经济的发展历程。考古学者一般将细石器划分为几何形和非几何形即细石叶形两大系统,广泛存在于中缅印交角区的是非几何形的细石器(图1)。

图1 水晶石叶、骨针^①

从我国的西北到西南,由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和齐家文化遗址到交角区内西藏昌都的卡若文化遗址直至最南部的云南元谋盆地,甚至在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与缅甸北部相连的区域内都出土了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细石器。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遗址,因其北邻甘肃,南接澜沧江中下游的云南,出土的细石器均为典型“非几何形”,并与陶器、打制或磨制石器以及骨器等都存在明显的伴出关系。细石器的制作类型、技术、风格都与西北地区马家窑的原始文化有着相类似的风貌;半地穴式的房屋建筑样式以及“粟”在卡若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表明卡若文化和西北文化的密切关系,而出现在缅甸北部与印度东北地区具有类似特征的细石器,昭示着这一区域也曾受到卡若文化的深刻影响。

早期在卡若文化出土的高领罐以及敞口盆等与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陶器均有类似形态,都有假圈足,且纹饰也以附加堆纹、网格纹和折线纹为主^②,显示出其在西进过程中与当地无陶传统融合而成。这也印证了韩建业教授的观点,马家窑文化在向西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卡若文化,假设马家窑文化的主人属于早期的氏羌系民族,卡若文化则是基于西北氏羌系统文化逐步产生的土著文化类型。^③卡若文化的这些特征也进一步对元谋大墩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昌都的卡若遗址外,与其属同一文化系统的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察雅县的江钦遗址以及云南的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大墩子遗址都有细石器遗存的发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林芝波密和墨脱^④发掘的陶器以及石器和卡若文化都非常类似,都存在规模较大的磨制和打制石器及陶片。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印度腹地的细石器基本为几何形细石器,而在中缅印交角区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发现细石器却与西藏东南部的细石器同为

①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门户网站, <http://www.uch-china.com/contentac.html?cid=553>.

② 韩建业:《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50—71页。

④ 《西藏林芝市拉颇遗址2021年考古发掘工作取得明显收获》,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uch-china.com),2022-5-13.

非几何形,且在大部分陶器碎片上都发现了简单和扭曲形的绳印、“人”字和“之”字形图案的装饰,其中以绳印装饰最为显著。^①这一情形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我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对此,考古学家安志敏也曾经指出,共同文化遗存在藏南和印度东北部的出现,表明两地之间新石器时代时期就已经存在着文化联系。

从细石器文化的族属上看,我们认为生活在甘青宁地区创造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古代羌戎系统族群为这些文化遗址的原始居民。在中缅印交角地区渐次出现细石器依稀展现了甘青地区原始文化南下后的西进过程,流传于印度东北部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也主要来自古代羌戎系统民族,这些实物遗存成为蒙古人进入印度的有力证明。也印证了历史学家的观点:今天广泛分布在印度东北地区及缅甸北部属蒙古人种的“波多”民族群体,就是历史上逐渐从中国西南部,途经西藏和不丹,迁徙到了藏南地区^②山脚下的喜马拉雅平原地带,即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民族群体。^③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古代西羌族主要生活在青海湖周边区域即当前我国四川、西藏、青海以及甘肃等地,其“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④人类学词典中的“西羌”也就是“先羌”“古羌”。“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獠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武都羌是也。”^⑤后因秦国持续对外扩张,羌人再次被迫走上向西、向西南迁徙的道路。众多的羌族支系逐渐分散在各地,居住在遥远西方的“发羌”和“唐旄”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后逐步发展成为唐代的吐蕃,明清时期被称为“西蕃”即当今的“藏族”。与藏族保持密切关系的珞巴族和门巴族则一直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缘的洛渝地区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数支生活在此的族群相互融合繁衍。时至今日,珞巴族祖先阿巴达尼与藏族的祖先是兄弟的传说还在当地广泛流传。“旄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昆明族”“摩沙族”等则继续向西移动,主要生活在横断山区,这部分羌人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先民。

在众多的南下羌人中,主要分布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旄牛羌是其中较大的一支,秦汉时期他们主要分布在沈黎郡(今四川汉源县),还有部分不断南迁至越嶲郡(川西南、滇西北及滇北地区),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⑥,表明战国时的旄牛种为羌人西迁南下至越嶲的一支发展而成,因而,旄牛羌也可以看作是越嶲羌。根据何耀华先生的研究,旄牛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后融入了不同的民族中,其中一部分形成了彝族,另一部分则进入川西南地区融入藏族当中,还有一部分与汉族产生了融合,向南进入滇西北地区的部分则最终发展形成今天云南兰坪、丽江等地的普米族。^⑦因此,我们认同在秦汉时期越嶲郡内,不仅生活着大量氏羌系统的民族,如:牦牛种羌人及其支系徙、祚都、叟族、僰族等,同时也有不少百濮系统的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邛人。

这样看来中缅印交角地区,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以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林芝波密和墨脱,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的细石器的主人应当属于氏羌系统的民族,而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大墩子遗址的主人属濮系民族之邛人。

二、石棺葬文化——氏羌系民族持续南下与濮系民族融合的文化类型

石棺作为一种石制棺材,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步延续发展至铜器时代而达到鼎盛。

① S. N. RAO, “Continuity and Survival of Neolithic Traditions in Northeastern India”, *Asian Perspectives*, 11(2), 1977.

② 我国的藏南地区在外文资料中被称为印方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笔者注。

③ 马得汶、李金轲:《印度波多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4期。

④⑤⑥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第1939、1943、1943页。

⑦ 杨福泉:《纳西族、藏族同源异流关系考略》,载《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石棺葬又称为石棺墓、岩板墓或石板墓等,在《史记·秦本纪》中发现了我国的最早石棺记录:“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①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与细石器相同,石棺依然最早出现在东北地区,随后从华北北部边缘逐步向西,到达甘青之后又往西南发展,进入青藏高原东部至云南的横断山脉,总体分布区域与细石器高度重合。^②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多个地区都发掘出了大量石棺葬,覆盖了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下游、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滇西北以及滇中高原、西藏东部。^③在缅甸北部实皆省的 Nyaunggan(缅甸良贡)、Chindwin(亲墩江)等墓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及梅加拉亚邦等地也发现与石棺葬相似的文化特征(图2)。

图2 丽江大具乡春秋战国时代石棺墓葬^④

石棺葬也是马家窑文化类型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文化因素,岷江上游地区是墓葬数量最多且发现最早的地区。这一区域因临近我国西北,墓葬的年代也晚于西北地区,因而基本可以确定此地的石棺墓是从西北地区经岷江向南传播而来;金沙江-雅砻江上游地区的面积较大,墓葬数量也较多,在墓葬中还发现有大量的细石器和骨器;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澜沧江上游:昌都热底垄,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剑川沙溪鳌凤山,香格里拉克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多幸村等河谷地区石棺葬与青海、西藏的关系较为密切;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范围最大,发现的遗址也较多。其中,以祥云大波那墓葬为代表的滇西洱海区域的石棺葬中的仰身直肢葬、火葬墓以及二次葬,都和岷江上游地区发掘的石棺葬在文化表现上具有同样的特征,墓葬结构也高度一致。这样看来,雅砻江流域和滇西北地区的文化同宗同源,都同属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在缅甸北部的 Nyaunggan 挖掘出的大陶罐也表明这里应该进行过二次埋葬,而 Nyaunggan 附近的 Chindwin 墓地大多数位于地表以下10厘米至150厘米间,属仰身直肢和仰卧的二次葬,其一个头骨在一个大罐子内^⑤。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邦及梅加拉亚邦也曾发掘出具有不同的尺寸的石墓或墓室。其中,纳尔蒂昂最高的一块巨石高820厘米,厚76厘米,宽202厘米。这些巨石大多是献给已故的祖先,火葬是处理死者的通常方法将骨灰和未火化的骨头被收集并存放在家族墓室或墓地。^⑥从这些墓葬特征以及存在的年代看,应当是源于甘青地区的文化元素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渗透至此。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②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60页。

③ 段丽波:《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西南氏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④ 丽江春秋战国时代古墓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D%E6%B1%9F%E6%98%A5%E7%A7%8B%E6%88%98%E5%9B%BD%E6%97%B6%E4%BB%A3%E5%8F%A4%E5%A2%93%E7%BE%A4/53235654?fr=ge_al.

⑤ Elizabeth Moore, “Bronze and Iron Age sites in Upper Myanmar: Chindwin, Samon and Pyu”, *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vol. 1, Spring 2003, pp. 24-39.

⑥ S. N. RAO, “Continuity and Survival of Neolithic Traditions in Northeastern India”, *Asian Perspectives*, 11(2), 1977.

从马家窑文化的民族构成看,石棺葬的主人应当是南下的氏羌系统民族。生活在黄河上游被称为“西戎”某一支氏羌系民族在向东北和西南迁徙的过程中,将这一葬具传播到西南的“西南夷”诸族当中,随着“西南夷”继续向南迁徙,这一文化特征也进一步传播至缅甸北部及印度东北地区,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石棺葬的分布状况。然而,在中缅印交角区范围内,石棺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局部地区发掘出的石棺特征不同,与其相关联的民族集团也各不相同。具体看来,在大渡河以北的岷江上游地区,石棺墓的年代多集中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其形制多为单人一次葬,石棺也较为窄长,陶器主要以双耳罐为代表,与西北地区存在联系,在晚些时候则又呈现相互渗透的形态;而大渡河以南的地区的石棺墓除少数个例外(香格里拉石棺墓与西藏、青海的关系较为密切)应为独立起源。段渝教授曾指出,位于甘肃中东部和南部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的寺洼文化类型,应属于古代氏族的文化遗存。^① 根据俞伟超教授的推论以及《后汉书·西羌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等史书的记载,众多学者都认同在西周时期,氏人和羌人共同杂居,并以“西戎”为名,但他们各自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童恩正教授对石棺的分布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石棺葬在青海地区往南传播,在川西高原(青藏高原东部)、藏东高山峡谷区(西藏)、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云南滇西北)等几个区域的分布最为广泛。^② 在这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石棺同样属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多属氏族;大渡河-青衣江流域的则属青衣羌和犛牛羌;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张王种陈列传》中记载的就有笮都、白狼、槃木、唐菽、楼薄、汙衍等“百余国”。但从族源上看,这些民族大部分都属氏羌族系。

根据这些民族的分布范围,我们可以得出,在中缅印交角地区滇西北横断山区昌都热底垄,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剑川沙溪鳌凤山,香格里拉克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多幸村;丽江大具、金江、石鼓、巨甸、桃花、红岩、格子、古渡、马鞍山等河谷地区的石棺是金沙江-雅砻江石棺文化的延续,属笮系民族,大致相对应于汉代的嵩、昆明^③,魏晋时期的摩沙夷^④,唐代的施蛮、顺蛮、磨蛮、磨些蛮^⑤,以及徙莫祗蛮和俭望蛮^⑥。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属古代邛都夷的遗存^⑦,而由前述所知这部分邛都夷是氏羌系民族与濮系民族的结合体;金沙江以南洱海地区的墓葬群包括大理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村、红土坡;弥渡直力;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永定、维的;武定田心;姚安黄牛山;下棋柳;楚雄万家坝等遗址的石棺是与滇族和洱海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农业民族,可能和靡非、牂榆存在一定联系^⑧,大体包括在剑川、楚雄、永胜和巍山的区域内。其文化类型与滇池区域属相同的文化系统,都是以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为主的民族,房屋的主要形式为干栏式,同有“椎髻”的发式,使用铜制物品,但铸铜技术不如滇池地区精湛。在西汉中期以前,这一区域仍属滇王国范围。这些情况可以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得到印证,夜郎西部区域有大量归属于“靡莫”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滇”

① 段渝:《先秦川西高原的氏与羌》,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65页。

③ 《史记·西南夷列传》:“(邛都)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

④ 《华阳国志·蜀志》:“定县: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微,曰摩沙夷。”

⑤ 《蛮书》卷四:“施蛮,本乌蛮种类也。铁桥(今丽江巨甸)西北大施啖、小施啖、剑寻啖皆其所居之地。”“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今丽江县一带)、昆池(今盐源县)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磨些蛮,在施蛮外”。

⑥ 《新唐书·南蛮传下》:“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在今楚雄、牟定、广通、禄丰、易门一带)。”

⑦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

⑧ 《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注“靡莫之属”：“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又注“牂榆”：“汉牂榆县在泽西益都。靡非，本牂榆王属国也。”

是其中规模最大并居统治地位的部族。洱海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极有可能属于“濮榆、靡非”。

要了解洱海地区的“濮榆、靡非”，首先要搞清楚“滇”民族的归属问题。我们比较认同童恩正先生的观点，认为“滇”属濮系民族系统。通过对“滇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椎髻、文身、衣长仅至膝下的宽大对襟式外衣、铜鼓、干栏式房屋、蛇之崇拜的要素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些文化要素呈现出强烈的南方民族的特征。而我国古代南方比较大的民族集团有“越”“濮”“蛮”等，再结合《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将滇濮连在一起的记载，以及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载：“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僂，僂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汉书·地理志》中“南贾滇、僂僮”。皆可证《史记》当中的“滇僂”所指的即是《汉书》中的滇，而“僂”即为“濮”，两字为同音异写^①。这样看来，“滇濮”应与“西羌”“南越”相类似，两个字分别指的是地域和族名。^②至三国时期，叟、濮仍然是滇池区域的主要居民。

此外，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也能判断洱海地区的濮榆、靡非是与滇同属于“濮”系统的民族。如：西汉时期，越嶲郡的青蛉县即为今楚雄大姚一带，在《汉书·地理志》有关于青蛉县境内关于“濮水”的记录，而“濮水”同样出现在了《华阳国志·南中志》之中，从命名上分析二者关系应该非常密切。唐朝时期西爨白蛮属滇人的后代，《蛮书》第四卷中有关于“弄栋蛮”的记录，“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以及关于“青蛉蛮”的记载，“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从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的萨鲁塔鲁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马拉克多拉的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绳纹标记陶器及巨石文化等基本文化要素看，印度东北部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毫无疑问的。^③生活在梅加拉亚邦的主要是属蒙古人种的卡西人，说一种仍然存在于缅甸和柬埔寨的孟高棉语系的语言，母系制度是他们的特点，再根据卡西人的民间传说：“Khasis 是一个语言群体，在史前时期通过 Patkoi (帕特开山) 山脉 (Gurdon 1975) 从缅甸进入该地区。”此外，从卡西人崇拜的“神舟”“蛇神”等文化元素来看，他们的祖先应该生活在我国古代濮人主要生活的地方，应当属濮系民族。由此我们认为，中缅印交角地区滇西北横断山区的昌都热底垆，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剑川沙溪鳌凤山，香格里拉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多幸村；丽江大具、金江、石鼓、巨甸、桃花、红岩、格子、古渡、马鞍山等河谷地区的石棺应当属氏羌系统的民族；而金沙江以南洱海地区的大理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村、红土坡；弥渡苴力；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永定、维的；武定田心；姚安黄牛山；元谋大墩子、下棋柳；楚雄万家坝等地以及印度东北地区梅加拉亚邦等地的石棺葬则当属濮系统的民族。

三、大石墓文化——以濮系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

大石墓是以重达数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而形成的方形或长方形墓穴的墓葬形式，大石墓在通常情况下规模要远大于石棺葬。这一类墓葬方式一般为不同形状的多人合葬，多半为氏族的丛葬墓。大石墓会用大小规格不同的石块堆砌四壁，再加上顶部的石板盖顶，内部分割成为多个空间，这种形式的大石墓又称为积石墓。^④

大石墓的分布地域与石棺葬相类似，在中缅印交角区域内常见于云南西部的姚安黄牛山、祥云检村、弥渡石洞山、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⑤，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昆明、越嶲分布

① 《吕氏春秋·恃君》记有“赞人”，高诱注：“哭，读为知句之句。”《路史·国名记》载：“奖，赞侯国，今戎之焚道，音扑。”

②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Elizabeth Moore, “Bronze and Iron Age Sites in Upper Myanmar: Chindwin, Samon and Pyu”, *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vol. 1, Spring 2003, pp. 24-39.

④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60页。

⑤ 张增祺：《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载《考古》，1987年第3期。

情况基本吻合,区域内的大石墓遗存很可能是“濮”人的文化遗存^①。这批大石墓的年代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并呈现出从金沙江南部地区逐步往向北发展的趋势。此区域的大石墓与川西南的文化遗存在墓葬构筑、年代、出土遗物等方面较为相似,分布的地域相连。^②从其文化特征看,大石墓的随葬品多为农业生产工具;丧葬习俗为合葬,多为以氏族公社的族群组织;在祥云检村出土的铜编钟上有孔雀纹,而孔雀一般出现在气候较为炎热的地方,依此推测大石墓的主人大概源于云南南部或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此外,在弥渡大石墓发掘出了从未出现在“昆明”墓葬中的铜发饰,由此可见,其主人有可能与“滇人”相同均为有发饰使用习惯的“椎髻”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中后期,大理祥云和弥渡仍存在少量多人合葬的大石墓,但其随葬品已与“昆明人”的垂直洞土坑墓形式大同小异。从其特征表现看,在此区域内生活的大石墓民族应当是与土著“昆明人”融合后,广泛接纳了“昆明文化”因而并未被驱逐。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西汉中前期往东大量迁移的“昆明”人造成了金沙江南部地区大石墓民族的逐步消失。大石墓民族中没有融入“昆明人”的部分因受到排挤而迁移到了永昌地区。

当我们将大石墓的分布地域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对比后发现,大石墓的部分区域与越嵩郡的地理范围有重合的部分。在《汉书·地理志》有关于其地理位置的描述如下:“越嵩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笮,会无,笮秦,大笮,姑复,三绛,苏示,阑,卑水,濞街,青蛉。”^③同时,在《后汉书·郡国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越嵩郡……青蛉,卑水,三绛(应为三绛),会无,定笮,阑(即应为阑),苏示,大笮,笮秦,姑复。”^④根据方国瑜先生的研究其辖境大概包括了今天安宁河流域与金沙江南北以四川西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⑤,其中,华坪、永胜、丽江、宁蒗、永仁等县、市包含在中缅印交角区范围内。

当前彝族居住的区域是大石墓广泛分布的区域,但彝族自古采用火葬且从不使用陶器,这样看来彝族和大石墓文化之间应当并无联系。然而从民族志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彝族曾经与濮人有过一段共处与斗争的历史。在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州时过着以畜牧为主的生活,而“濮苏乌乌”则早已在那里经营农业过着定居的生活。在此后的民族斗争中,彝族战胜了濮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占为己有。这一段历史在彝族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语言中也可见端倪,彝族对混乱的事物进行形容时会用“濮合诺合孜”进行描述,翻译过来即“濮话彝话混杂不清”之意^⑥,这也算是对两个民族杂居历史的印证。

大多数学者认同大石墓文化主人为濮人,是沿澜沧江河谷进入滇西的一支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⑦,结合我国《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早期从我国东南沿海到当前越南北部地区曾广泛分布有“百越”族群,其西支被人们称作“雒越”或“骆越”,“骆越”西北和西面即今云贵川地区以及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从先秦时期直到汉代都有不同类型的民族杂居,其中就有“濮”的一支。后经考证表明汉朝时期生活在永昌郡的濮人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分别被人们称作苞满、闽濮,此后又被人们称作猓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棘濮等,元朝后多被称为蒲蛮或蒲人^⑧。此后,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佉德昂语支的佉、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

①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志(卷六十二)·文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0页。

②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志(卷六十二)·文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0页。

③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④ 《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511页。

⑤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132—134页。

⑥ 段丽波:《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西南氏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⑦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⑧ 段丽波:《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西南氏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我们更加认同的是另一种观点,这里所指的濮人应为当时的邛都即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①在秦汉时期越嵩郡内,不仅生活着大量如:牦牛种羌人及其支系徙、祚都、叟族、僰族等氏羌系统的民族,也有不少百濮系统的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邛人。“邛都”在最初的时候应当是一个地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之后便成为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民族的统称,在跟随这些民族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邛人”“邛民”以及“邛都人”的称呼便传播开来。因而,虽然同被称为“邛都人”,但实际并不属同一来源,这些“邛都人”有的为百濮系统的民族,有的则为氏羌系统的民族。

由此可知,从地理分布上看,生活在安宁河两岸越嵩郡与大石墓文化重合部分的是属百濮系统民族的邛都人的主要聚居地,未重合的部分则是属氏羌系统民族的邛都人主要生活的地域。在中缅印交角区域,华坪、永胜、丽江、宁蒗等地的大石墓文化属氏羌民族系统的邛都人;而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的大石墓文化则应该是百濮系统的民族在继续往南经缅甸北部穿过巴特开山(Patkoi)山脉直至印度东北地区迁移的过程中留下的遗迹。

四、有肩石器与有段石铤——百越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

有肩石器也称双肩石器,器形扁而且宽,其肩将整个器型划分为上部和下部两个部分,因上部有作为装柄的双肩,即称“有肩石器”,其中以石铤居多,也有少量的斧和铲,日本学者多将其称为“有肩石斧”。石铤为磨制石器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器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有段石铤”是形式较为特殊的石铤,由于在石铤背部偏上位置有凹槽、横脊或台阶,铤因此被划分成上部和下部,上部能够装柄^②,因而人们通常将其称作“有段石铤”。和普通石铤相同,有段石铤的形态为梯形或者是长方形,均为单面刃。根据剖面特征和段部特征可以将有段石铤划分成弧背形、隆脊形、台阶形、有肩星以及凹槽形等形式(图3)。^③中缅印交角区经常同时发掘出有段石铤以及有肩石器,因而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论述。

图3 有肩石铤正、反面^④

有肩石器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广西、广东、港台地区和云南,以及缅甸、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孟加拉等国;有段石铤则在中国的东部、南部沿海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和内陆的江西、云南等省份,甚至在南美洲和南太平洋及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两种石器的分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铤文化。

①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78年第2期。

②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③ 吴锦吉:《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

④ 怒江州文物管理所, https://www.sohu.com/a/431455847_120056320。

有肩石器分属南北不同的系统,广泛分布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有肩石器均归属于珠江三角洲文化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有肩石器主要分布在珠三角的中心地带——广东地区,这一区域的有肩石器数量也最多,因而将这一区域类型的有肩石器划分为珠江三角洲类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东西樵山文化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肩石器开始进入广西南部地区。在云南大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并未出土有肩石器,表明在此出现有肩石器的时间较晚。而在江川李家山^①、晋宁金沙山^②以及石寨山的遗址中虽然发掘出少量有肩石器^③,但从其常与青铜镞存在的伴出关系看,有肩石器在此出现的时限最晚已至青铜时代。同时,在祥云检村、五指山、大理金梭岛和剑川海门口都有被称为“空首钺”的武器出土,其造型结构与有肩石斧非常相似,二者显然存在密切联系,因而我们认为滇西地区仍然属于受有肩石斧影响的区域。所以,从发现有肩石斧的区域、数量和年代来分析,源于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从广西南部开始逐渐西移,在此过程中对印度及中南半岛等多个地区和国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④。1980—1983年,印度地质调查局(GSI)在对位于孟加拉平原两侧的特里普拉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广泛存在与印度东北地区的石斧。从类型学上来说,发掘于阿萨姆邦的石器工具包括肩形、三角形、四边形的各种研磨石斧、磨石、杵和磨石(Sharma, 1979)。而来自梅加拉亚邦加罗山的工具,从粗糙的片状工具到精细打磨的类型都有。更值得关注的是,特里普拉邦的石器特征与缅甸非常相似,目前发现的特里普拉邦的史前记录印证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印度东北部和东南亚之间就存在文化联系,尽管有印度缅甸山脉的巨大障碍^⑤。Sharma(1984年)指出“印度东北部的新石器时代工具传统”包括高比例的有肩石器、四边形的轴和弦纹陶器等独特元素,是支持阿萨姆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东亚亲缘关系理论的一些有力证据。同时,具有类似特征的青铜斧彩陶和镶嵌在装饰精美的青铜门柄上的宽花瓣形铁剑(Win Maung 2002, 2003),在缅甸北部实皆省的布达林镇以及蒙图等地也都有发现。有段石铤则最早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源于这一区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这一阶段的石铤数量较少,器形厚重,还未发现明显分段,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和原始。从良渚文化开始,石铤开始广泛分布中国从北至南的16个省区当中,这一时期的石铤数量较多,分布范围较广,制作也较为精良。当有段石铤的制作技术进入广东时,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因而,有段石铤在与有肩石器在相互交汇融合之后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即有肩有段石铤。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融合后,其制作工艺与有肩石器一同逐步向西流动,其中一支经广西南部一直扩散至中南半岛诸国。另一支则沿红水河向西,沿南、北盘江流域扩散,因而,在云南麻栗坡小河洞、江川头咀山、晋宁石寨山和贵州水城、威宁等多个地区,都发掘出了有肩石器、有段石铤以及有肩有段石铤^⑥。

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流动路径可以划分为东路和西路两路,其中前者主要流动到了印尼东部、菲律宾、新西兰和玻利尼西亚^⑦;其中后者主要流动到了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南半岛等地区。在我们主要关注的西路,在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以及元江—红河等众多江河的沟通中,使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期内也开始产生了联系。

① 蒋志龙:《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社会结构解析》,载《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② 蒋志龙、杨成洪:《云南晋宁金沙山墓地发掘新获成果——为认识滇池盆地的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kaogu.cn),2015年12月7日。

③ 徐继涛:《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kaogu.cn),2017年6月5日。

④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N. R. Ramesh, “Discovery of Stone Age Tools from Tripura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GEOSEA V Proceedings vol. 1, Geol. Soc. Malaysia, Bulletin* 20, 1986, no. 8, pp. 289–310.

⑥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⑦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在中南半岛五国发现的有肩石器基本都属珠江三角洲类型,但出现的时间晚于我国广西和广东地区,此外,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广泛存在于印度东北地区的有肩石器也同属珠江三角洲类型。

由此,我们认为有段石铤在与源于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相互融合发展后,从西路主要沿着我国南部的海岸线向西发展,从广西扩散至云南再到马来西亚、中南半岛、孟加拉以及印度。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主要分布在江川头咀山、晋宁石寨山、安宁王家滩、昆明王家屯、剑川海门口、大理金梭岛、五指山和祥云检村以及缅甸北部的实皆省的布达林镇以及蒙图和印度东北部的 Teliamura、Jirania、Sonai bezar、Sonaram、Mohanpur 和 Agartala 以及南特里普拉区 Udaipur (Gumti 山谷) 附近的 Jamjuri 等地。^① 但这一区域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的年代已近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

大量的考古研究表明,有肩石器、有段石铤以及几何印纹陶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古代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即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台湾;又从广西、贵州、四川到云南直至东南亚的广大区域,在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的器形从大到小,从粗糙至精良,从原始到精致的各种类型都非常齐全。“百越”是汉文古籍中对西周至秦汉时期活动在中国南方沿海以至今越南北部越越部落的概称,也被称为古越族或越族等,越人分为较多支系且各个支系都有种姓,但因其语言和文化相通,因而在战国、秦汉时期被人们称作“百越”。《吕氏春秋·恃君览篇》中所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即是对当时这一时空族群的概括。^② 百越民族的生活区间较为宽泛,从吐蕃高原以南经闽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一直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印度阿萨姆之间的广大区域范围内,均为百越民族聚居之地。汉朝后,因民族迁徙、融合以及分化,不同地区的百越形成了不同族名,“越”这一名称逐步消失在历史之中,而其裔则有了多种多样的族称,比如俚、鸠、僚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百越先民”与“百越”的时空内涵略有不同,“百越先民”一般指在这一区域范围内一定历史阶段生活的土著共同体,不能将其理解为现代意义的“民族”,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在文化传承以及血缘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大族群^③。而“百越”则可认为是生活在这一范围内的古越人,则可称为百越族群。

在中缅印交角区内属于百越民族群体的遗址中,滇池区域内发现的有段石铤数量较多,缅甸北部则多数分布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干燥地区,从北部的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出土的主要石器有肩石斧、石锤、石凿^④;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以及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⑤发现的有肩石器、石铤等都与云南出土的石器器形相符^⑥。阿萨姆地区还曾经发掘出了独特的圭形石凿^⑦,这一器形也常见于我国西南地区。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大致以印度河为界,渡过印度河后便呈现与印欧语系诸文化相互衔接的态势。

由此,从地理空间上看,生活在滇东南的百越民族群体应该属于骆越先民,而生活在滇南及滇西南地区的则属滇越,滇池地区则应当是以百越文化为主的区域。是同属百越群体的不同支系,我国许多古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蜀国)东接

① N. R. Ramesh, “Discovery of Stone Age Tools from Tripura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GEOSEA V Proceedings vol. I, Geol. Soc. Malaysia, Bulletin* 20, 1986. 8, pp. 289 – 310.

②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③ 史式、黄大受:《台湾先住民史》,九州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④ 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⑤ 董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

⑥ 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第45—67页。

⑦ 杨甫旺:《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载《云南文物》,1994年,第45—51页。

于巴,南接于越”(《华阳国志·蜀志》)。^① 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干燥地区即从缅甸北部的克钦山区直至南部的掸邦以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越民族群体,应当属秦汉时期的滇越。^② 这样看来,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中缅印交角区从怒江中游直到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都广泛分布着百越民族群体。

五、总 结

公元前3000年左右,源于我国西北甘青地区的氏羌系统民族由青藏高原东南缘不断南下的渐次迁徙过程,形成了氏羌文化由北向南的单向传播,对交角区内文化交流的空间特征造成了直接影响。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古代民族的南下迁徙,是通过岷江及嘉陵江进入金沙江沿岸,留下了以元谋大墩子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公元前2500年前后,西藏昌都卡若文化的氏羌系统民族开始沿澜沧江和金沙江等河谷南下至滇西地区,在以永平星光村和大理银梭岛二期为代表的遗址中留下了以点划纹和刻画纹为主要纹饰的黑陶器。在公元前1500年到前1000年间,氏羌民族再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受此影响使洱海地区的考古文化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特征,以洱海银梭岛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区域开始出现了麦作农业。公元前900至前500年间,氏羌文化已经广泛影响到了滇西北区域,随后在剑川海门口表现出的稻米与粟米以及小麦并存的文化特征都是这次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见证。随着秦国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扩张,氏羌民族再次开始了向南的迁徙,我们从这一阶段在岷江上游出现的石棺葬,安宁河流域分布的大石墓中发现的双耳陶罐和动物纹样的青铜器可以看到氏羌民族南迁的痕迹。特别是以石棺葬为主要特征的石器文化存在着多点分布的特征,并呈现出进一步交融的趋向。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上游的石棺葬与滇中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的石棺葬并不属同一民族系统,也就是说石棺葬的起源并非一元,存在不同族群共享同一文化的现象。

此外,从中缅印交角区内与氏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细石器遗址的分布看,部分氏羌民族甚至已经迁移至印度的阿萨姆地区,这些氏羌系民族应当是从缅甸的密支那、勐拱经钦敦江上游至户拱谷底到达那加山区再翻越帕特凯山达到印度阿萨姆的民族,这一迁徙的过程应当也在缅甸北部留下了细石器的遗址,但因为材料的缺失,未能找到缅北地区细石器遗址更多的具体地点,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还会进一步探讨。至秦汉后,源自甘青地区的氏羌民族便基本不再有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氏羌民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进入青铜时代后,源于我国长江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流域的百越民族群体经广西进入到中缅印交角区内,并通过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以及元江—红河等大江大河的沟通,进一步与中南半岛产生了联系。与百越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包括:干栏式建筑、有肩石器与有段石铤、稻作文化等。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铤沿广西南部向西及西南扩散开始出现在中缅印交角区内。在昆明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与青铜镞共存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在大理洱海区域的剑川海门口、大理金梭岛、五指山和祥云检村的石棺墓中虽然没有直接发现有肩石器和有段石铤,但都出土了与有肩石斧的造型基本相同的被称为“空首钺”的武器,明显是受到了百越文化有肩石斧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具有典型的百越文化特征“干栏式”建筑,但稻米与粟米以及小麦等多种谷物并存的现象表明,在青铜时代以剑川海门口为代表的滇西地区已经成为氏羌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汇地。

^① 王文光:《并非永恒的空间——百越及其后裔地理分布动态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② 王文光:《并非永恒的空间——百越及其后裔地理分布动态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从有肩石器与有段石铤的数量、地域以及年代来看时间上看,滇池区域是最早受到百越文化影响的地区,随后进一步影响到了滇中的元谋大墩子及滇西的洱海区域,之后则进一步扩散至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干燥地区,从北部的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以及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① 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至秦汉时期,百越族群分布在从吐蕃高原以南经闽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一直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印度阿萨姆之间的广大地域范围内。由此看来,随着百越族群不断向西及西南方向的迁徙,将这些具有典型百越文化特征的因素广泛传播至中缅印交角区,也正是因为百越族群的迁徙和流动,使区域内呈现出文化的共享性,这些相同或相类似的文化因素同时也表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缅印交角区内就已经存在着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缺乏具体的考古材料,我们只能从印度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有肩石器,绳索压印陶器和稻米农业等三个典型的与我国西南文化相类似的特征来推断氏羌系统民族的向南迁徙,南迁路线中的石器和陶器类型的退化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② 基于考古数据最新关于水稻种植起源的理论也表明,起源于我国长江盆地的水稻比东南亚农业的早了大约 3000 年。乔治·范·德里姆(George Van Driem)对语言和考古学相关性的研究认为是濮系民族先于氏羌系统民族将石器文化以及稻米种植的技术经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南河、湄公河和红河传入缅甸北部及印度东北地区。总体看来,新石器时代中缅印交角区就已经存在着古代先民的流动,氏羌族群的南下,百越族群的西进进一步加快了这一区域围绕着石器文化的共享和交流。

Abstract In the Stone Age, migration and flow of ancient peoples existed i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na, Burma and India, which made the stone culture in the area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mogeneity and shar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designs and patterns of the stone tools, we can roughly inf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adual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Diqiang ethnic groups from today's Gu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of China. After entering the Bronze Age, the Baiyue ethnic groups from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China continued to move westward, resulting in their ful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indigenous Pu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na, Burma and India and the Diqiang ethnic groups that had arrived earlier, which made the stone culture further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penetration and interweaving, vividly explain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ncient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ymbiosis.

(李佩燊, 讲师,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及旅游管理学院, 昆明, 650504)

[责任编辑: 黄凌翹]

① 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

② K. N. Dikshit, M., "The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India and Adjoining Reg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Ancient Asia*, no. 7 & 8, 2011. 12.